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六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三四期 ——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10f)

---

【当事者说】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	康庭梓
【史海钩沉】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丁 抒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当事者说】

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

• 康庭梓 •

◇ 北京飞往山海关“紧急任务！”“加16吨油！”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由于我被指定为假日值班机组成员之一，象历次任务值班一样，在前一天晚上给妻子打了电话，说明本星期日飞行值班，不能回家。我家住在北京市区，是爱人带着不足两岁的儿子跑了几十米远，到街道安装公用电话的人家接听的，儿子还在电话里叫了几声“爸爸”。

9月12日白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北京西郊机场里呈现着正常星期日既不紧张又不冷清的气氛。我抓紧这点空闲时间洗了毛巾被，学习了一会儿飞行专业英语，将自行车保养一番，同时，也没有忘记保持了多年的文艺爱好，拉起二胡自我娱乐一番。下午6点钟吃晚饭，象平时一样到空勤食堂就餐。我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穿的飞行工作服，想到这个星期日的飞行任务值班就要过去了，心理上有一种自我放松意识。

我和许多空勤人员正在就餐的时候，突然，接到飞行大队值班员的通知：  
“有紧急任务，你马上跑步到团会议室！”

我象以往接到紧急任务时一样，扔下饭碗，立即行动。

这次任务下达是从9月11日即星期六的午饭后开始的。当时，担任专机师副政治委员的潘景寅来到我所在的飞行团三大队找大队政委和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赶上两位同志都不在大队，潘景寅就对我说，空军胡副参谋长亲自告诉他，三叉戟256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对于副统帅的任务行动要注意保密。除了我参加机组以外，潘还宣布了机组的其他成员：团司令部副参谋长老陈任第一副驾驶员，团通讯副主任老陈任机组通讯员，三大队领航副主任担任领航员，三大队机务中队副中队长李平任机械师，机械师张延奎任机械员，机务副中队长邵起良任特设师，师专机服务队小魏担任空中服务员，潘景寅任机长。三叉戟256号专机组共有9名成员组成。我是第二副驾驶员。

潘景寅提到的空军司令部的胡副参谋长，原来是专机师的师长，叫胡萍。这个师的前身还是独立飞行大队的时候，他就担任大队长，是第一个执行毛泽东主席专机任务的机长，也曾多次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空中飞行顾问出国访问。胡萍还兼任专机师的党委书记，是专机师最高行政领导和技术权威。

林彪决定乘坐三叉戟专机是1971年9月以前的事情。这是我从种种迹象和同志们私下议论中判断出来的。我作为基层飞行中队的队长，除正式下达飞行任务以外，象如此绝密的信息是无法得到的。当时，我的判断根据有两条，第一、飞机座舱内设施的改装不同寻常。256号飞机作为1970年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几架三叉戟飞机的最后一架，是我从广州同巴基斯坦飞行员一起试飞合格后接回北京的，它是几架飞机中性能比较好的一架，没有更多地投入训练与任务飞行就开始对机舱及有关设备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改装、更换。江青多次乘坐过的三叉戟254号飞机，舱内的设施就很讲究。256号如此改装，其执行任务的级次不会亚于254号飞机。第二、林彪以前经常乘坐的英制子爵号飞机，每年的冬季和夏季都来往于北京—扬州、北京—山海关、北戴河之间。每逢国庆盛典，林彪是必须参加的，所以，常在国庆节前的9月份从外地乘飞机回京。综合以上几种因素，看来林彪要使用三叉戟专机的可能性很大。为了保证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中央早已决定不让毛主席坐飞机了，因此，处在副统帅地位的林彪无论从党内、军内都是专机任务中的头号人物。为了保证他的飞行安全，专机部队从上到下，全力以赴。我作为机组成员之一，除了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之外，别无任何选择。

#### ◇ 机前待命

当我接到通知快步跑回飞行员宿舍的路上，看到了大队机务副中队长、三叉戟256号主管机械师李平，他对我说：

“潘副政委交代要把油加到16吨，飞机要在7点以前准备好。”

“什么？16吨油？”既是惊讶，又是反问。

飞机要加16吨油的事使我产生一些疑惑。三叉戟飞机加满油为21吨，空中平均耗油量为每小时4吨，低空耗油每小时5吨。北京到山海关的距离为300公里，往返的油量加上飞行条令中规定的落地后最少一个小时的剩油量，有10吨或最多12吨足够了，15吨油是北京飞往广州这样的距离最合适的油量。当时，我脑子里只想着国庆节快到，用三叉戟到山海关接林彪回京，没想到要到别的地方。现在，既然师的副政委、机长交代加16吨油，自然有他的道理，很可能暂时不回北京。

我跑回宿舍，除了拿上必备的航行包和飞行资料外，还拿了一身洗换的内衣和洗漱用具，都没有来得及回头对宿舍多看上一眼，扭头就走。没想到从这次迈出飞行员宿舍的门槛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踏上离开飞行事业的不归路。

在飞行大队楼下，碰见大队领航副主任、机组领航员老李，他也是接到紧急任务的通知后，从住在机场范围内的家里赶回来的。当时，我就把加16吨油的事对他讲了，并提醒他带上牙具等，我发现他同样带着一脸的问号，眨了几下眼睛，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快步上楼取航行资料包了。

在团司令部首长办公室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机组成员有团副参谋长、机组第一副驾驶员，团通讯副主任、机组通信员外，还有团政委、代理团长（团长出国在外）以及团司令部值班参谋等。我看到领航员老李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也带上了随身用品。此时，看到机长潘景寅快步跨进办公室，说：“你们快到外场值班室要个车等我！”边说边拿起桌上的电话。

西郊机场停机坪上，整齐地排列着几架三叉戟飞机，流线型的机身后面竖立着高高的尾翼，机身两侧带着后掠型的机翼，远远望去，银光闪烁，美丽的雄姿给人以跃跃欲飞的感觉。256号飞机下面人头攒动，机声隆隆，空地勤人员正按照各自的分工进行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辆为飞机加油的油车停在机翼的前面，加油导管连接在机翼下面，燃油沿着管道将飞机的能量之源输进飞机的油箱，这是决定着林彪座机256飞机命运的关键因素，因为，这是256飞机的最后一次加油，从此256飞机在空中可能飞行的时间和最远的飞行距离已经被限定了。

我对多加油的事一直未能释怀，除了认为北京到山海关距离近没有必要多加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在9月7号用三叉戟252号飞机以训练的名义送林彪之女林立衡到山海关去过，知道山海关机场修建多年，跑道道面不平，飞机在滑跑中颠簸较大，如果带着多余的油量落地，会因机身重量增加而增大飞机的负荷。我把想法告诉了正在检查飞机的副驾驶老陈，心直口快的老陈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地说“北京到山海关一跨子远，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加完油后，我听到李平对潘景寅说：

“潘副政委，油车的油全部加完了，不够16吨，而是15吨。”此时，站在旁边的老陈还未等潘景寅说话，就抢先说：

“15吨油都多了，不要加了！”我看到潘景寅欲言又止。

紧急任务使大家没有吃好晚饭。此时，后勤保障部门又将晚饭送到停机坪。潘景寅边吃饭边对机组说：

“今天我们使用252飞机的代号。”我当即提醒他说：

“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呢！”

“不办了。”机长肯定地说。

重要专机面前又一个疑点滑过去了，因为机组中对此没有人提出疑义。252号飞机是几架三叉戟中当一般专机使用的，客舱内设备一般，大都是座位。飞机的其他设备也没有256好，因此252号飞机都在载人较多或平时训练时使用。

机组在待命的时候，我看到服务员小魏连同服务用具一起，由车送到飞机旁边，大家动手将服务用具装上飞机。

过了7点，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可见机场营房灯光闪烁。还不见乘机的人到场，“紧急任务”变得不紧急了。既然飞机在停机坪待命，说明乘机的人无须在候机楼登机，这样在我的判断中更进一步证实是到山海关接林彪回京了。夜色里，机组人员包括空中服务员小魏在内，都处在起飞前的等待之中。入秋，北京西郊机场的星期日之夜是那样安静，除了三叉戟停机坪灯火明

亮之外，在空旷的机场里隐约可见停放在其他机坪上的苏制伊尔—18飞机，图—124飞机、英制子爵号飞机等。在宁静的夜里，唯一陪伴它们的是巡逻值勤的警卫战士。此刻，谁也未能料到一架三叉戟256号飞机的起飞，不仅将划破西郊机场夜空的寂静，也将为整个专机部队带来一片混乱。

#### ◇ 北京起飞

机前待命中发现移动的灯光从机场东侧候机楼方向过来，黑暗中灯光的移动很明显。在场的人不约而同朝灯光方向望去。快接近时，看清是一辆兰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其实，这辆车没有直接开到三叉戟停机坪，而是到一大队伊尔—18飞机停机坪绕了一圈才开过来的。事后知道是开车的人心情紧张认错了路，他就是林彪死党之一刘沛丰，40多岁。同车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翻译程洪珍及戴眼镜的陈某。将车上拉来的东西卸下之后，由姓陈的将车开走。汽车本应从飞机的前面沿滑行道行驶，但他却从飞机左机翼下快速开出，差一点与左机翼相撞，联想到开车来时走错路的情景，看来这些人已成惊弓之鸟。

在场的人都帮助往飞机上装拉来的东西，大小皮箱约十余件。我是在飞机上摆放东西的，我亲眼看到刘沛丰手拿几个不大的小包，问正在机上工作的特设师邵起良：

“我坐在什么地方？”

“坐在中舱。”邵起良用手指了一下中舱的位置。因为前舱安装的是床、沙发，是首长坐的地方，所以，一般随行人员都坐在中后舱的位置。按说，刘沛丰关心的应该是那些精致的皮箱才对，为什么要把这几个不起眼的小包放在他的身边呢？对此，我当时并没有怀疑。然而，事后才知道，包里的东西与机组人员的命运直接相关。

机舱内，借助飞机通电时的灯光可以看到机长潘景寅同刘沛丰在谈话。刘还问我，能向外打电话吗？我回答通过机场总机可以向往打。我没有发现他去打电话。

7点30分，一辆小轿车停在飞机旁，从汽车里出来的人急忙登上飞机，我没有看清一共有多少人，只借着灯光看到一位身着空军军服的年轻人，他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机械师以熟练的动作收上简便登机梯，关上飞机舱门，机组对发动机启动前的各项设备情况检查完毕后，机长通过驾驶舱侧面的窗口向地面人员示意开车，得到地面人员允许后打开启动开关。此时，我开始听到机身后面那熟悉的发动机启动运转时的轰鸣声，对热爱飞行事业的我来说，如此美丽动听的声音就象一场音乐会的前奏曲那样，在它之后，进入各个乐章的交响曲将响彻天空。机场跑道的方向是南北的，飞机得到指挥塔台的允许，徐徐滑进跑道的南端。当晚，天空晴朗，灯明星稀，三叉戟256飞机在3台发动机强大马力的推动下，象离弦之箭弹了出去，发动机的轰鸣伴着一阵呼啸声，逐渐消失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的上空。飞行员的职业习惯使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此刻是1971年9月12日19点40分。

起飞时，随着机长潘景寅的右手将3台发动机的油门推向最前端，飞机上的15吨燃油以每12分钟近1000公斤的速度燃烧着。256号庞大的机体在毫不留情地吞噬着油箱中那点生命之源。此刻，飞机上心怀叵测的林立果等人不可能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所乘坐的专机将成为埋葬他的坟墓。

#### ◇ 向山海关航行

由于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员，前驾驶舱的岗位上没有我的位置。飞机起飞后，我就坐驾驶舱后面的第一个专机舱的沙发上，沙发的对面是一张供乘机首长休息的床位。据说林彪怕风，机场修理厂的同志在安装床位的时候，为避免飞机上循环流动空气吹到床上，想了不少办法，

特意在床与飞机走道之间安装一道隔帘。沙发安装在飞机专机舱的右边，人坐在那里与床是相对的。

我坐在沙发上，通过飞机右边椭圆型的弦窗，居高临下，首都北京那初秋时节美丽的夜景一览无遗。心想，自己从事专机工作时间不长，就能在祖国最好的飞机上开始执行国家最重要的专机任务而感到骄傲。

飞机在爬高中很快把北京市甩到了后面。此时，我的视线离开窗口，很自然地后面扫了一眼。通过中间的门，看到第二客舱内，两个身着军装的人对坐在小桌的两侧，他们分别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也许我的动作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立即停止了对话，并同时把脸都转向我，盯住看了一眼，使我觉得不自在起来。事后回忆，当时他们看我时，面部表情阴森可怕，这是我以往执行任务中不曾遇到过的瞬间感觉。因为，机组成员中，除服务员、特设师、机械员之外，其他人员都在操纵飞机的岗位上，一般除了上厕所是不到后舱来的，不在座位上的机组成员除服务员因工作需要同乘机者接触外，也不到后舱走动，乘机的首长和随行人员没有什么事情也不同机组人员交谈，也不去更多注意机组人员的活动。相比之下，当时刘、林二人对我如此注意，我想，一方面怕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另一方面在心里算计着空中一旦阴谋败露，将如何对付这位不在驾驶岗位上的年轻小伙子（当时我只有32岁）。若在地面，一粒子弹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在空中尤其在数千米的高空，问题就显得复杂得多。

当航程接近一半时，郇起良到前驾驶舱传达3件事情，郇说：

“首长让我问一下，机组都是谁来了。”机组的人都习惯对乘机者称“首长”

“老的都来了！”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老陈不加任何思考地回答。郇接着又问：

“山海关调度室主任那里有保密电话吗？”等了一会儿，我看机组内没人回答，我说：“有。”因为，我在9月7号飞山海关时，曾到调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间去过，看到他桌子上有3部电话，听老李说在不同颜色的电话机中，有的电话是加密的。

“首长让通知地面，准备一辆车子。”郇起良最后说。

256飞机在晴朗的夜空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航行，到达山海关上空。山海关机场修建在离海边不远的平原上，机场的跑道方向与海岸线的方向大致相似，呈东北—西南方向。

机长潘景寅与副驾驶员老陈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他们娴熟的驾驶技术再次在山海关机场夜间落地动作中得到证实。此时，时钟走时为20点15分。256号根据指令停放在机场候机室前面宽大的停机坪上，在白炙灯的照射下，可以看到不少机场地面保障人员正在忙碌。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飞机按地面信号员的指挥停稳之后，关闭了所有的发动机和有关设备，顿时，被飞机发动机吵闹不安的机场变得十分安静。林立果走向飞机驾驶舱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几乎是所有乘机者下飞机前都有的礼节性的表示。在机舱内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在较近的距离内，我再一次打量眼前这位年轻的空军军官，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身材，浓眉大眼。他下机之前对机组说：“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

林立果同刘沛丰下机后钻进吉普车，很快消失在停机坪之外的黑暗中。

◇ 又要加17吨油

按专机任务规定，专机每到一处停放过夜之前，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这一工作通常叫“飞行后”。虽然，256号飞机从北京起飞到山海关落地只用了35分钟的时间，飞行中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也要按规定做好“飞行后”。再说，三叉戟飞机首次执行林彪重要专机任务，更要按规定严格执行，不能发生任何一点差错。

在飞行后的检查中，发动机部分是机械师们检查的重点。此时，机组中除机械师之外的其他人员也在帮机械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空中服务员小魏留在飞机上整理客舱的清洁卫生。我在飞机后面左侧发动机处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中加添润滑油，一不小心将润滑油弄在他的上衣工作服上，我急忙向他表示欠意，平时少言寡语的张延奎憨厚地一笑，算是对我的不慎表示谅解。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

“将飞机的油量加到 1 7 吨！”

“加 1 7 吨油！明天飞往何处？”我没等李平回答，抢在前面向机长提出反问。从在北京听到加 1 6 吨油开始，多加油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好奇心使我很想知道飞机的去向。

“等一会儿咱们到飞机上研究一下航线。”机长潘景寅答非所问，他边说边往飞机的前方走去。

机组除机械师、服务员外的人员在飞机上研究航线时，潘却没有叫我参加。我是机组第二副驾驶，正常情况下，机组中有机长和一名副驾驶员就足够了，因为，飞机上只有正副驾驶两个人的位置。潘景寅这次让我也加入到机组中来，我想，一来是专机任务需要，多来一名飞行员作为备分；二来潘是师一级领导，除飞行外总是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做，不能把精力全部集中在飞行业务上来，我的加入可以在这方面给以弥补，以往的飞行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潘的技术高明，经验丰富，资历较深，但对新机种座舱设备的具体位置及使用方面有时记不清楚，需要一名副驾驶给于必要的提醒。2 5 6 机组中，从飞行、领航、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人员的配备，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尖子，在部队的人员中，已无法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在机组老飞行员面前，无论从年龄、资历等方面，我都是一名小学生。所以，在 2 5 6 机组中我只是按自己的业务水平提出一些问题，决没有要改变领导意图的想法，机组其他人在飞机上研究航线没让我参加，我也不以为怪，仍继续帮机械师们做飞行后的检查工作。

机械师李平对要加 1 7 吨油的事是很重视的，因为这是机长的安排。我站在飞行员的角度，还是可以对多加油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对机械师来说只有去执行；加多少油，不是机械师业务范围内做主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我对于加 1 7 吨油过于敏感了，所以研究航线时有意让我回避，防止我当着大家的面再次提到多加油的事情。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的方法。因为，三叉戟飞机与当时的其他飞机相比，有着许多先进的地方，就加油方式而言，除了同其他飞机一样的重力加油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压力加油方法，即在地面用一个特制的管子接在油车的加油导管上，从机翼的下方直接插入加油孔，靠油车的压力将油加入飞机油箱，这种方法既快又省力。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说，山海关机场油车设备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

“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安排，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不知道当天晚上有紧急起飞的可能，也就是说，潘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如果潘能意识到半夜有紧急出动的可能的话，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是 1 7 吨，而是将油加满到 2 1 吨。虽然，压力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重力加油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使用这种方法加油，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

从“九一三”事件256号飞机活动的整个程序看，9月12日晚加与没加那17吨油，是个很关键的动作。潘当晚没有坚持加油，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已经9点多了，还没有吃晚饭，加油会使晚饭拖得更晚；其二、加17吨油停放过夜，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是不允许的；其三、如果加17吨油既成事实，会在晚上的机组会上，因为油量会再次引发对飞行航线的讨论，这正是潘景寅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在做“飞行后”的过程中，还发生一件不被机组人员注意的事情。借着停机坪亮如白昼的灯光，我看到从北京随机到达山海关的两位身着空军军服的女兵，曾到飞机上去过一趟，每人拿了一个军挎包后离开了飞机。机组人员都在忙于自己的工作，谁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乘机者身上。然而，有一点我是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圈的，即在当晚的乘机者中，除刘沛丰、林立果两个人乘车离开机场之外，还有谁离开了呢？在另外的三个人中，起码可以断定这两位女兵没有离开。但也许已经走了，又想起什么东西忘在飞机上，为了取东西又回来一趟。我联想到先前在北京往飞机上装东西时，刘沛丰手拿一些东西，特意问自己坐在什么地方，似乎东西和人不能分开，那么他同林立果走时，是否也把东西带走了呢？

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所以，机械师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

山海关机场是属于海军航空兵驻军的基地，驻场的海军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不在了。据说也是林彪常住北戴河的需要，为了不影响北京到山海关往来频繁的飞行活动，连人带飞机都搬到别的训练基地去了。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机场场站的人员。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几乎都是同山海关机场海军的同志们打交道的。

在通常情况下，飞机停放有警卫战士站岗即可，对于重要专机，按规定负责警卫的档次就要提高，力量也要加强。因此，当晚担任飞机警卫任务的都是海军排以上的干部。山海关场站为了使专机的保障工作做得更好，更及时，还特意在机场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电话。

飞机交接完毕后，场站领导考虑到机组在北京起飞前没有吃好晚饭，特意开来一辆中型轿车，拉我们去食堂就餐。此刻，空旷的机场上，一阵凉风从海边吹来，单薄的夏季飞行服挡不住初秋的凉意，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机组中唯一穿皮夹克的特设师邵起良，看到同志们怕冷的样子，说：“我的布工作服就在飞机上，拿下来给你们穿。”大家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但谁也没有增加衣服。

食堂离停机坪不远，当机组下车陆续步入食堂的时候，我看到从北京同机到达山海关的程洪珍同两位女兵也在食堂用餐。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精制的手提皮箱，两位女兵身上左肩右斜背着刚才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因为互不认识，谁也没有打招呼就分别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两张桌子并不是紧挨着的，中间还隔一张空桌。只是从机组进入食堂之后，那两位女兵不时向机组这边送来警惕的目光。这时，我才比较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三位乘机者。程洪珍不足30岁，中等身材，着空军服装，面庞白净，外表看去象个知识分子，给人以文弱书生的印象。两位女兵在18到20岁上下，身材高窕，眉清目秀，身上那套军装显得有些肥大。两位姑娘在一起，一点也没有女孩子扎堆时的活跃气氛。她们没有同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到北戴河林彪的住处。但是，另外让人感到费解的是：在机组检查飞机的一个多小时内，山海关场站一定为他们安排好了晚上休息的房间，他们也一定是先到房间后到食堂的，机组人员手里拿着东西是因为从停机坪直接到的食堂，而他们三个人为什么不把提包放在房间里，连吃饭都要带在身边呢？

事变之后，两个女兵中那个小一点的亲口对我说，在机组进行飞行后检查时，程洪珍把她

们叫到房间，对她们说：

“我们跟着林副主席没有错，眼下我们要听林副部长（林立果）的指挥。”说完，从提包里拿出两支“五九”式手枪，分给她们每人一支，还有两支由程自己拿着。由于她们女孩子家没有办法把枪带在身上，才特意到飞机上取来军挎包，把手枪装在里面背在身上的。其实这两位姑娘根本就没有打过枪。

吃完饭，大家回到招待所各自按照分配好的房间休息。潘景寅是师一级的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里，服务员小魏同两个女兵安排在一间客房里，剩下的人被安排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这栋平房呈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间由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常住在那里，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从第三间开始由机组分配。我做为机组的第二副驾驶员，按机组出差在外的生活习惯，是负责行政工作的，我就按照机组组成的特点，结合平时住宿的习惯分配了住房。机组的3位机务人员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是一个飞行大队的，住第四间，第五间应该是团司令部的两位老陈了。

机组成员各就各位，有的在床上稍事休息，有的找有水的地方洗一洗。大家从下午6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也有点累了。我站在门口问隔壁的副驾驶员：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其实，我也知道按任务飞行的规定程序，还有一个机组会没有开。我想，当天只飞行了短短的几十分钟，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机组讲评会不开也罢。

过了几分钟，潘景寅来到平房，要开机组会。于是，大家很快聚集在机械师的房间，屋里3张床坐9个人挤得满满的。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做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

“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大概是指当时在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谣传的“吴反林”，即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流言。

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

机组最关心的就是飞向哪里，只有知道了航线才能对天气、地形、备降场等因素对飞行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因此，机组向机长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现在还不知道航线，那么明天飞行时航线沿途飞行的地面保障怎么办？因为，飞行航线通常要提前向航线经过的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以便沿线有关机场及有关调度部门提供必要的电台及航行资料，保证航行的准确性和安全。对此，潘回答：“关于航线保证，空军司令部航行局会及时安排的。”

其二、不知道航线，天气情况如何了解？因为，沿线气象情况对飞行有着直接影响。这个问题是我提出的。对此，潘的回答是，明天到机场气象台看一下全国的天气图就行了。此外，机械师李平汇报了飞行后检查飞机状况良好的情况，服务员小魏主动检讨在北京起飞时没有固定好茶具打坏了几只杯子的事情。机组会上再次体现出机组作为一个战斗的集体为保证专机飞行安全的敬业精神。关于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潘景寅说：

“明天6点钟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我看一看手表，时间指在22时40分。

机组会结束后，各自回到安排好的房间。在我隔壁的3位机械师，因体力劳动比别人多一些，很快就关门睡觉了。没想到从这一刻开始，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初秋的海边，夜深风凉，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窗口和门是紧靠在一起的，窗口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一米远。我将开着的窗户紧紧地关了起来并拉上窗帘。也许就是这个普通的动作，把我们同机械师关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仅一墙之隔，后来竟没有听到机械师们起床时的任何动静。

过了一会儿，听到潘在门口问我：“副中队长王某回来恢复飞行没有？”

“白天恢复飞行了，夜间还没有。”我一边起床，一边回答。

“还有大队长呢！”这是隔壁副驾驶老陈的声音。他显然听到了我与潘景寅的对话，快言快语的他就抢先做了回答。

潘景寅所问的王某是三叉戟中队的副中队长，他刚从外地学习一段时间回京。按规定飞行员停止一段飞行活动后，在执行任务之前，要进行恢复技术的飞行工作。潘问我的意思，可能要王副队长参加另外的任务飞行。隔壁老陈的回答显然更快地理解了潘的意思。他说的大队长就是三大队的一把手。陈的意思是说，如果王某没有恢复飞行的话，大队长也是可以参加任务飞行的。事后我才知道刚才这段对话的原由。机组会之后，潘接到北京胡萍的电话，问三叉戟中队中能执行任务的我，为什么也到山海关去了？原来，按林彪的计划，在北京夺权不成，就带着同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如果这样，专机师的大飞机，几乎要倾巢出动。当再安排一架三叉戟飞机感到人员紧张时，胡萍想到了我，所以打电话问潘。现在想起来，如果胡萍早一点想到我，我就会躲过这场灾难。

入睡之前，我还问同屋的领航员老李：“你们不是在飞机上研究航线了吗？”

“只是估计了几条航线，有重庆、大连、广州等，没有说准到什么地方去。反正我的领航记录纸都已经备份好了。”领航记录纸是一种领航业务的准备内容，可以提前准备好。

山海关机场9月12日深夜的11点钟，表面看来是十分安静的。我带着一天的疲劳很快进入梦乡。

□ 《航空知识》 2002年2月号

~~~~~

## 【史海钩沉】

### 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

• 丁 抒 •

1966年5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党内“路线斗争”频发的中共高层，叶剑英能安渡迭起的政治风波且最后起到如此作用，值得研究。“文革”前叶剑英不在中共核心权力圈内，他资历虽老，但长期担任参谋职务，从未实际主掌过一支军队，没有自己的“山头”。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仅叶剑英一人未担任过方面军或战略区的主要领导。然而，他的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使他免受“文革”的冲击。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1962年林彪告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由于贺、罗

在“文革”前夕先后被毛泽东清洗，叶剑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渐成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于权力之作用他自然一清二楚。在1965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1）“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2）12月间毛又对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要造反哪！”（3）中共中央本来就在毛泽东的严密掌控之中，毛这么说，当然是隐指中央别的人可能会搞“政变”。1965年初，毛泽东曾当面讥讽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毛之所以毫无顾忌地这么说，是因为他牢牢掌控着军队。而一旦他对军队高层的忠诚产生怀疑，走马换将立刻接踵而至。为了把军队掌握在绝对可靠的人手中，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换主持军队工作的领导人罗瑞卿、贺龙，将军队日常事务的管理权移交叶剑英。

本文侧重分析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同时辨析目前国内关于“文革”初期清洗罗瑞卿、贺龙等若干重要事件的流行说法之可靠性。

### 一、清除罗瑞卿：毛泽东的“文革”准备

“文革”前夕至“文革”初期，罗瑞卿和贺龙因忠诚度遭到毛泽东的怀疑而被清洗。当时罗瑞卿不仅是总参谋长，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1962年毛泽东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5）

罗瑞卿主持军队工作，作风强悍，与贺龙以外的其他军委领导人关系不甚融洽。连他的朋友陈丕显都说：罗很有能力，但“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有意见”。当时军队的重大事务往往由贺龙和罗瑞卿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毛决定后再通报林彪，而林彪则很少主动过问，仿佛置身度外。例如，1964年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贺、毛两人谈话中三言两语就决定取消军衔。在军队事务中如此重大的事情，决定过程中并未征求林彪这个名义上的国防部长的意见，而是由罗瑞卿回到北京后打电话向林彪通告该决定。1965年4月底，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昌向毛泽东请示有关5月初召开军委会议的有关事项，包括取消军衔以后的新军服、帽徽、领章的样式等。毛批准之后，罗瑞卿才向林彪汇报。（6）

在林彪与贺龙之间，罗瑞卿与贺龙的接触多，而与林彪接触较少。毛泽东曾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7）由于罗、林之间关系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阂，以致于有一次林彪与罗谈话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8）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提醒罗：“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的太少啊？”（9）然而，说林彪因此就打算搞掉罗瑞卿，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共的事实际上完全是毛泽东一人当家。而且林的一个特点就是平素做事决不出头，哪怕决定取消军衔这样的大事时被搁置一边，他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毛的意见或暗示，林彪不会出头打罗瑞卿。

1965年5月初叶剑英的班子为一次军委会议准备了会议总结。因与会者要求由罗瑞卿做总结，罗便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的总结，改由自己来作，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有

人撰文写道，叶剑英等人对罗瑞卿的做法不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与此同时，毛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10）此说尚无旁证，但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何林彪突然对罗瑞卿发出凌厉的批评。5月25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书立即告诉罗瑞卿：“不准任何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11）就事论事地看，针对罗瑞卿取代叶剑英做总结这件小事，林彪的这个态度似乎与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若联系到毛指责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其中是否有毛准备从罗瑞卿手中收回军权的意味？事隔不久，1965年11月初，军委机关奉命开会批判罗瑞卿的副手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萧随即被“监护审查”，由杨成武兼其职务。当时罗瑞卿尚未被撤职，但基本上被架空了。这样重要的会议，是谁下的指令，谁主持，叶剑英、杨成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现在官方所有的文献均对此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官方强调这样一种说法：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夫人叶群向毛泽东递交亲笔信，大肆诬陷罗瑞卿，毛偏听偏信，结果冤枉了罗瑞卿。

林彪派叶群递交的那封所谓“诬陷罗瑞卿”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12）

此信中提到的向林彪提议揭发罗瑞卿的“重要的负责同志”是谁？不会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会是周恩来、贺龙，只可能是叶剑英或其他人。由于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迄今为止未披露任何材料加以说明。但是，叶剑英一生谨慎，如果他向林彪告罗瑞卿的状，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安排。

除掉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部署还是林彪利用毛整肃罗瑞卿？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承认：“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13）该书提供了一种猜测：“如果（毛）对林彪的告状不准，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就认可了林彪的诬告。（14）罗瑞卿的女儿亦持此见：“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15）林彪死后，毛泽东自己把此事全部栽到林彪头上：“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16）毛泽东说的是实话吗？他在事关重大的军权问题上是个可以轻易被骗的人吗？

林彪11月30号写的这封信会不会是林彪按照毛清除罗瑞卿的意图写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其他各大报均未转载，毛泽东相当愤怒。11月26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时告诉毛，他还没有读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当晚，江青与罗瑞卿见面时问罗：“姚文元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没有转载？”（17）她还说，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因为“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于是罗瑞卿亲自给彭打电话，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8）当时彭真是毛泽东已决定要清除的目标。很可能毛泽东从其情报来源获知电话内容，所以后来罗瑞卿此举被指控为“给彭真通风报信”。

1965年11月下旬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如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11月30日林彪写了那封“诬陷信”后，让叶群从苏州飞到杭州向毛告罗的状。但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的回忆是：“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19）至于是哪一天，他没有说。有人指出，11月29日毛泽东办公室曾通知叶群到杭州向毛汇报，当时毛就5月军委会议总结发言一事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嘛！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师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师做总结？”（20）“这位老师”指的就是叶剑英。若此事确凿，那就是说，11月29日叶群在杭州毛泽东住处即已得知毛的意图，她汇报完之后当然会马上赶回苏州向林彪报告。

据张耀祠回忆，11月30日杨成武打电话给他，要他到杨的住处去一次。该日下午张到杨的会客室，随后叶群就来了。张写道：“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21）但叶群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面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亲信。倘若不知道毛对罗瑞卿的真实态度，长于韬晦的林彪要密告罗瑞卿，一定会做得非常机密，绝不可能让叶群到杨成武的会客室里张扬此事。叶群之所以不避讳杨、张二人，很可能是因为她不仅知道毛对罗的态度，而且知道杨成武等也知情。张耀祠就说过，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除罗瑞卿时，除周恩来、林彪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也知情。（22）杨成武可能知情的另一个依据是：11月18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份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记说，这是林彪“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23）向林彪递送这份报告的人就是杨成武。（24）事实上，就在叶群向毛面呈递林彪信件的同一天，北京的中央军委机关会议就已经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了。（25）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做了批示，不点名地批判了罗瑞卿：“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26）“（他）不愿意突出政治……（但）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27）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点名批判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28）

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既未涉及彭德怀，也没把罗瑞卿与高岗、饶漱石扯到一起。用高岗抹黑政敌向来是毛泽东的惯用招数。1959年他清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时就用过这样的手法。当时毛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他们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29）

毛泽东作出批判罗瑞卿的批示后不到一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这次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身为广东人的叶剑英欣然从命，用苏州腔唱了一曲。（30）罗瑞卿刚倒台，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为什么有如此好的兴致让叶剑英唱评弹？或许是因为他看到叶剑英紧跟、配合毛泽东，立了功？这可算是周的一种表态。

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能在“文革”期间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员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员、常委乃至副主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对罗瑞卿面对面地批判斗争。为此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邓小平不能经常到会，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他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3月18日，罗瑞卿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交待问题。罗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见毛泽东。周回答：“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随即挂断电话。罗瑞卿在绝望之下，当天从自家的三楼平台跳楼，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1）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念了宋朝辛弃疾的一首“贺新郎”词，叶把原词中“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改了两个字，成为“将军一跳身名裂”，以讥笑罗瑞卿。（32）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叶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33），罗点点此话或许言重了，但杨成武说叶剑英的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34），就全然不顾事实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35）是叶剑英主持写的。批罗会议结束时，叶剑英看到毛泽东又决定清除彭真，便马上紧跟，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信，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36），对彭真落井下石。

## 二、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代之

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打击的目标。

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放任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1962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10分钟就走了。1964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1964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37））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1966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38）

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甚好。1965年11月30日的军委机关会议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当时贺龙还叫会议主持人不要胡乱猜疑。12月2号，也就是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野心家”的那天，军委机关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会议简报将要写上“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坚持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39〕

4天后贺龙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会议竟然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造访贺龙住处。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说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40〕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突然被打倒，贺龙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此时贺龙才感觉到，罗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牵连到他，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会后，毛泽东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41〕，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随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毛泽东忽然交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偏僻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就这样，毛泽东以“下去视察”为名把贺龙赶开，为叶剑英在北京主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贺龙视察完毕4月9日才回到北京，而罗瑞卿则早在20天前就于绝望中跳楼了。〔42〕

此时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未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一直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43〕贺龙“靠边”以后，毛曾说过，要对贺龙“一批二保”。〔44〕但毛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于是贺龙的厄运降临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45〕后来，周恩来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军委会议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46〕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1927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47〕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尽管大难在即，贺龙仍然拒绝低头。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绝指称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

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在外宾面前点名批判贺龙。1967年2月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49〕当时汪东兴奉毛的指令负责主持中央专案组，专案组在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50〕中央为了给贺龙罗织罪名，还采用了逼供栽赃等种种手段。例如，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

结果和夫人杨岗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称“兵变”成功后，贺龙要当主席，张经武将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7天而死。（51）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而代之，由叶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52）

### 三、1966—1967：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政治漩涡，躲在外地，所以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上是叶剑英。因此叶剑英从“文革”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 1、从负责“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到进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因为罗瑞卿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对公安部队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如此重要之事，毛并未通报林彪。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3人，林彪并未参与。应当说明的是，杨成武与萧华都参与倒罗活动，告过罗瑞卿的状。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批判罗瑞卿时，负责组织会议的就是这3位，叶剑英为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开了，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之前，要确保对首都局势的控制。于是，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据此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就是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杨成武负责协调工作。当时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53）“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建制便由1个师扩充成4个师。（54）调进北京的这两个师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召开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参会名单当中。在这次会上，叶剑英被“扩大”进来为毛助阵。毛在会上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55）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8月4日晚，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56）后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林彪于8月6日赶到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发起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

## 2、在“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杨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叶剑英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主持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57）由于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所以通常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现在的官史提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说他当时“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伙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叶剑英发怒一事发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就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其实是个误会，因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一变再变而造成了江青和叶剑英的分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后被打倒，叶剑英并未出面保护这两位军队的老干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后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或许对批判萧华有所不满，但他并未打算保护萧华，他参加了这次军委会议，会上预定当晚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然而，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定批判萧华的想法。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萧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萧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毛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他们“立功”心切，所以当天半夜抄了萧华的家。（59）仓皇中萧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萧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便收留了萧华。徐向前很快知道杨勇透露消息一事，于是便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继续开会。杨勇到会场时萧华还未来，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来后讲了昨夜被抄家之事，于是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远端骨折。叶当时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60）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反诬杨勇，声称是杨要“打倒萧华”。2月3日毛会见外宾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袁子钦也因被诬要“打倒萧华”而遭打击。叶剑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为杨勇和袁子钦解释辩诬，而是与聂荣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北京军区司令杨勇。（62）又过了3个多月，毛泽东出尔反尔，又要打倒萧华了。（63），这一次叶剑英一声不吭，他不保萧华，但仍然把杨勇关在牢里。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过，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杨勇是怎么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便顺手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 3、1967年的“2月镇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65）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1967年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封公开信（66），要求他们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并用飞机大量散发。据周恩来说，“抓了10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67）

紧接着青海省发生了军队屠杀群众的事件。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军管。由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动员其支持者守卫报社，赵永夫谎称“八一八”开枪，遂派军队进攻并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在此过程中军队打死平民169人、打伤178人。（68）赵永夫当时还调去了一个喷火器班，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进攻报社的军队未使用喷火器，否则报社以及大楼内的1千余人人都难幸免。事后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69）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动军队，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12人。（70）在赵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乱”期间，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71）由于毛泽东本人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72），叶剑英便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73）叶剑英让赵永夫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后果。这一波“镇压反革命”全国共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对此事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说的：“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2月建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74）

### 4、老干部“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谓的“二月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1966年12月初，毛泽东认为，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指示要开会批评陶铸。12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召开名为“生活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陶铸。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铸到外地去考察，毛拟定了一张20多个各省市领导人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75）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铸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后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77）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

毛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确实，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陶铸讲的话并不算数。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78）“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79）于是社会上呼喊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一个月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再次出尔反尔。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与会者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80）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叶剑英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一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81）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的意见：“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82）这时连陈伯达也以为毛真的转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陈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议是江青组织的，是江青派人叫陈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于是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杀了。（83）在这种气候下发生了所谓的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后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84）徐向前的回忆是：“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85）会议开始时，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叶剑英接着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87）

当时陈毅的发言把“文化革命”与1942年的“延安整风”联系起来。陈毅说：“延安整风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88）“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89）陈毅提到的这6个人都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成为党内的2号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6个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90）但是陈毅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毛泽东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实，几天前毛泽东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假意责备，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几次出尔反尔的责任。怀仁堂会议上陈毅、谭震林的发言触到了毛的痛处，毛便“龙颜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一次既非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通知了几个人参加，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按中共的制度来说，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会议，只是毛泽东对几个“廷臣”训话而已。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91）“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

群同志你告诉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93）“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94）“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95）“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96）

毛泽东讲完话即扬长而去，留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毛泽东发怒时，叶剑英自然不会给谭、陈、徐辩解，更谈不上与毛“抗争”了。其实，谭、陈、徐等几个老干部本来也没有胆量挑战毛泽东，他们不过是错会了“圣意”，以为毛泽东是真心斥骂陈伯达、江青，大概陈伯达快倒台了，这才放胆“大闹怀仁堂”的。应当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或者所谓的“二月抗争”。由于叶剑英在这一事件期间并没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过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叶剑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而陈毅则被赶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至此叶剑英在“文革”期间的崛起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在自己最后的时日里又想贬黜叶剑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甚至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但当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贬黜叶剑英，也已无力处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时，叶剑英的位置与作用已别无他人可以替代。

注 释：

- （1）《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31页。
- （2）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78页。
- （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第40页。
- （4）“文革”结束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的谈话，引自高晓岩“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华夏文摘》增刊第349期（2003年7月22日）。
- （5）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 （6）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页。
- （7）出处同上，第209页。
- （8）1927年中共在南昌组织武装暴动时，林彪任连长，贺龙则是军长、总指挥。
- （9）出处同注（6），第209—210页。
- （10）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华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
- （11）出处同注（6），第254页。
- （12）1965年11月30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亦可参见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
- （13）出处同注（6），第283页。
- （14）出处同注（6），第284—285页。
- （15）《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页。
- （16）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 (17)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353页。
- (18) 出处同注(6),第278—279页。
- (19) 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3页。
- (20) 出处同注(10)。
- (21) 出处同注(19),第182页。
- (22)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第29—30页,转引自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 (23) 出处同注(6),第281页。
- (24) 出处同注(10)。
- (25) 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北京),公益图书馆扫校(www.npo.org.tw)。
- (26)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引自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第283页。
- (27)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96—198页。
- (28) 出处同上,第201页。
-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31页。
- (30) 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 被人放入箩筐游斗”。张佐良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罗瑞卿跳楼后,张是第一个赶往罗瑞卿家中为其诊断的医生。
- (31) 出处同上。
- (32) 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第9页。据陈虹的文章,杨成武透露叶剑英写的是“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第62页刊登了任可的读者来信,指出陈虹的文章引用有误。任可写道:“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
- (33) 罗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杂志,1998年第5期,第39页。
- (34) 出处同注(32)陈虹的文章。
- (35) 中共中发(66)268号文件,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 (36) “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8号附件,1966年5月16日发出,转引自余汝信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471期(2005年12月19日)。
- (37) 廖的前妻是贺龙姐姐的女儿。出处同注(1),第284页。
- (38) 《打倒三反分子贺龙(第1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整理,“红代会国家体委运动系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翻印),第2—3页。
- (39) 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www.npo.org.tw)。
- (40) 出处同上。
- (41) 出处同注(39)。
- (42) 出处同注(39)。
- (43) 出处同注(39)。
- (44)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页。
- (45)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华夏文摘》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46〕1968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47〕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见1966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等单位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革”参考资料（2）》。

〔48〕出处同注〔39〕。

〔49〕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转引自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文章，出处同注〔45〕。

〔50〕1967年底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给康生的报告，《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第91页。

〔51〕董保存，《走进怀仁堂》（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任志伊，“驻藏代表张经武辉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2〕1967年7月8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原载第10研究所《东方红》（39期），1967年7月2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1期转载。

〔53〕吴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5页。

〔54〕《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47页。

〔55〕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58页。

〔56〕出处同上，第59页。

〔57〕《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页，转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5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页。

〔59〕出处同注〔44〕，第65—68页；亦见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载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

〔60〕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9页。

〔61〕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290页。

〔62〕出处同注〔46〕。

〔63〕后来毛泽东在“九大”期间（1969年4月13日）说：“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4〕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中发〔1971〕148号文件。

〔65〕出处同注〔44〕，第87页。

〔66〕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42页。

〔67〕出处同注〔46〕。

〔68〕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35页。

〔69〕出处同上；参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页。

〔70〕1967年4月10日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21页。

〔71〕出处同上。

- (72) 出处同注(44), 第96页。
- (73) 1967年4月20日安绍杰(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44页。
- (74) 出处同注(46)。
- (7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页。
- (76) 曾志,“陶铸在最后的日子里”,《文汇》月刊1986年9月号;权延赤,《陶铸在“文革”中》,第196至215页。
- (77)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见1967年2月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等编印的《大字报汇编》,第47页。
- (78) 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7)》(1968),第243页。
- (79) 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页。
- (80) 王力,《现场历史:“文革”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29—30页。
- (8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页。
- (82) 出处同注(80),第30页。
- (83) 出处同注(80),第30页。
- (84) 出处同注(80),第31页。
- (85) 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15页。
- (86) 出处同上,第14页。
- (87) 《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2卷,第68页。
- (88) 出处同注(80),第30页。
- (89) 出处同注(81),第210页。
- (90) 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页。
- (91) 项南,“‘该我开炮了’——谭震林与‘2月抗争’”,《人物》双月刊,1992年第6期,第58页。
- (92) 当天林彪称病,让叶群代表他出席了这个会议。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5页。
- (9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页,此段文字引自赵峻防、纪希晨的《“2月逆流”》。
- (94) 出处同上。
- (95) 出处同注(46)。
- (96) 出处同注(90),第128页。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

